



《尚书·金縢》“周公居东”再析*

张新斌 马嘉琪

摘要:汉代以来,史家对《尚书·金縢》中“周公居东”含义的理解,一直有“周公待罪避东”和“周公东征”两种说法并争讼不断。“周公居东”由管蔡流言引发,而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本质上针对的是周公在武王死后摄政乃至称王是否合理的问题,这是影响周公“待罪避东”或“东征”的关键。从周初王位继承的实际看,当时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真正确立,周公在武王死后摄政乃至称王是合理的。周公不会因管蔡流言而避居于东。“周公居东”有两层含义:一是周公为了巩固翦商大业,选择东征讨伐管蔡与武庚叛乱;二是周公面对管蔡流言为稳定周族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应对叛乱,以避居的姿态来打消统治阶层内部对自己的摄政疑虑。

关键词:《金縢》;周公居东;王位继承制;待罪避东;东征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055-06

《尚书·金縢》是一篇有关周初历史的重要文献。文中记载了武王崩、成王即位之初,周公代成王摄政而遭管、蔡等人流言诽谤之事。周公面对管蔡流言,以“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1]197},然后“居东二年”作为回应。通过对“辟”之字义的不同解读,自汉代以来,人们对“周公居东”产生了“周公待罪避东”和“周公东征”两种说法,至今仍争论不休。清华简《金縢》公布以来,学者们对“周公居东”问题进行了重新讨论^①。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围绕汉儒以来形成的“避居”和“东征”两种说法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各自的合理性,争论仍未得到解决。汉代以来形成的由管蔡流言产生的周公“避居”与“东征”两种说法,应从武王死后,时人以及后世学者对周公摄政乃至称王的态度来寻找根据。正是在认同与怀疑周公摄政乃至称王合理合法性两种不同态度的影响下产生了“避居”与“东征”两种争论不休的观点。

一、周公摄政称王的合理性

武王在克商两年之后即因病而死,成王尚幼,外部反周势力暗流涌动,刚刚完成翦商大业的姬周王朝尚未完全安定。周公为稳定局势代成王摄政却遭管蔡流言,周公选择以居东作为回应。关于此事,《尚书·金縢》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1]197}

清华简《金縢》记载:

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亡以复见于先王。”周公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2]158}

从《尚书·金縢》和清华简《金縢》对于周公

收稿日期:2022-10-27

*基金项目:河南兴文化工程委托项目“黄河流域夏文化与早期国家的形成研究”(2022XWHWT16)。

作者简介:张新斌,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河南郑州 451464),主要从事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马嘉琪,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郑州 450001)。

居东事件的叙述可以看出,除居东时长不同外,两个版本表达的意思相差不大。汉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尚书·金縢》中“我之弗辟”的“辟”字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马融说,“辟谓辟居东都”,又引郑玄语:“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谦让为德,我反有欲位之谤,无以告于先王。言愧无辞也。居东者,出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3]可见马融、郑玄认为“辟”为“避居”。又《尚书》伪孔传载:“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东征之。”^[1]¹⁹⁷根据这两种不同解释,“周公居东”产生了“避居”和“东征”两种不同说法。从两个版本《金縢》的表述可以看出,致使周公居东的原因在于管叔及其群弟的流言,而流言的中心思想在于周公摄政将危及成王之位,周公有篡位之嫌。换言之,作为对流言的回应,周公居东是“避居”还是“东征”,应从管蔡流言是否属实,即周公摄政或继承武王之位是否符合周初王位继承规范,舍弟传子王位继承制在周初是否确立稳定进行考虑。

那么,武王死后,周公是否有权继承王位?《逸周书·度邑解》记载:

王□□传于后。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手。^[4]²¹⁸⁻²¹⁹

关于《度邑解》中缺文,黄怀信认为缺“命旦”二字,即“王命旦传于后”,意为武王命周公继承大位;关于“建庶建”,他认为第一个“建”,为立也,“庶建”当作“叔旦”。由此可知,武王生前有意传位于周公,但被周公拒绝。应该说周公在武王死后是有权继承王位的。“兄弟相后”,说明殷商时期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法仍然适用于周初王室。“我筮龟其何所即”说明在周初,有以占卜方式选择王位继承人的传统,也间接说明了父承子继的王位继承制非周初定制。此外,《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5]¹⁵²²对于周公葬所,周公选择葬在成周,而成王最终将周公葬在了毕地,葬所选

择的不同体现着周公以谁为君的立场问题。从成王的角度来说,其与周公的关系,至少不能以君臣而论。此事虽然并不能表明周公有权继承王位,但却以成王的口吻表现了周公在周初王朝中的特殊地位。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提到:“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6]²⁹⁰其本意是表达周公摄政称王符合殷商王位继承法,但此段话所述周先祖传位实际表达的是传子之制中的传非长子之意。接着他又论述:“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周公既相武王克殷胜纣,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已摄之,后又反政焉。摄政者,所以济变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6]²⁹⁰这段话中“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王国维实指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公始。武王死后,国家尚未稳定,需要一位功勋卓著、德才兼备的年长者继承大位,而周公无疑成了最为合适的人选。《国语·晋语》记载:“(文王)度于閼天,而谋于南宫,諏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7]《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5]¹²⁰武王伐纣战役之中“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5]¹²⁵。从中可以看出,周公确实功劳卓著。因此,“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周公继承武王之位合情合理。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公始,在其文后续表述中更为清晰。“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于旧制本有可以为天子之道,其时又躬握天下之权,而顾不嗣位而居摄,又由居摄而致政,其无利天下之心?昭昭然为天下所共见。”^[6]³⁰⁰此种制度即指立子立嫡之制,王国维认为此制由周公制定也就表明了周公在确立此制之前有权继承王位。

王国维认为子继之法自周公始,自是以后,遂为百王不易之制。西周王室在周公之后天子继位确实严格遵循子继之法,但仍有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身份继位之例外。周书灿以

鲁国庄公以前常有弟接兄位、齐桓公夫人和如夫人之子均可继承王位以及宋国王位继承弟及和子继并存等为例,认为自周公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的论断并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②。由此,无论周公之前还是周公之后,子继之法都不能说是定制。

舍弟传子之制并未成为定制,在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制的传统下,周公在武王死后即使真的代成王自立也无可非议。郭沫若认为,管、蔡散布流言之举实则是充当了反对兄终弟及制,推行传子传嫡制的前驱:“周公本人在初犹实践兄终弟及之制,于武王没后,自践图籍而为天子。继因管、蔡反对,以至兄弟交争而以兵戎相见,殷之武庚乃乘机而起叛乱。管、蔡乃传子传嫡制之前驱。”^[8]这种看法应是从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的表面说辞中得出的,没有看清管、蔡的真实目的,并且把管、蔡推到“传子传嫡之前驱”地位,未免有些过誉。其实,“管蔡之乱并不在于周公是‘破坏父子相继’的传承途径,而在于周公超越管叔践位,违背了‘兄弟相及’的合理次序”^[9],是“兄终弟及”体制内的“兄弟之争”。这才是管、蔡的真实目的。管叔此举看似为成王,实则为己,“公将不利于孺子”只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目的在于武王之后按照“兄终弟及”继承法则,以武王弟、周公兄身份继位称王,而其后与武庚合谋反叛,则彻底暴露了其真实意图。在“兄终弟及”继承制下,武王之群弟在理论上都有权继承王位,武王选择周公是因周公“勋劳最高,以德以长”,是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周公在管、蔡事件之后意识到了“兄终弟及”传位方式之中存在的这种争斗隐患,因此决心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此制可能并不符合周代的历史实际,但在西周王室王位继承中,还是较为严格地实行着。

无论是从周初王位继承制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从管蔡流言的真实目的来看,周公以兄终弟及方式继承王位都是合情合理的。周公所考虑的是国家大计,不会因为管蔡等人的流言就选择以“待罪避东”的消极方式作为回应。相对于流言,流言之后管、蔡与武庚的合谋反叛,对灭商仅两年时间又逢武王刚死、成王初继位、国家尚未稳定的新生姬周王朝来说无疑是巨大

的风险,如果不能及时剿灭,翦商成果将会毁于一旦。因此,周公必定会选择东进讨伐叛乱。

二、周公东征平叛铲除隐患

管、蔡与武庚的合谋反叛本质上是武王灭商的遗留问题,周公东征则是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众所周知,武王克商是一次以弱胜强的战役。牧野一战,武王表面上取得了对商作战的大胜利,实则商族大部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实力尚存。牧野之战的胜利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殷商晚期对东夷用兵导致实力大挫,二是商族内部的分散疏远使商王在殷周战争中处于孤立处境。东夷侵扰是殷商后期商王面临的一大困扰,《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10]为解决这一问题,商纣王帝辛对东夷进行了大规模的用兵。《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11]^[1467]并没有达到良好效果,反而使自身实力受到极大损失,加速了殷商王朝的灭亡。对于后一方面的原因,学者们多有论述。杜正胜认为殷代氏族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们对殷商王室不一定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即使是殷王后裔之族,武王革命对某些人来说,不过是换了一位共主,无所谓亡国之痛。他们愿意归顺周人,小邦周也乐于接纳”^[12]。许倬云从宗教祭祀方面进行了说明,“祖灵祭祀逐渐确立……宗教上有排斥他群的现象。原本是多族群的商王国竟因此而丧失了向心的凝聚力”^[13]。作为对多数商人宗族表示出与周人合作意愿的回报,商族群体原来的生活方式、宗族祭祀以及相应的政治地位、军事实力都被保留了下来。《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5]^[1589]可以看出,在武王伐商后,殷余民被封给武庚,原有的殷商宗族体制也被保留了下来。“殷周间的主从关系发生颠倒,殷人的政治势力却未因此遭受彻底毁灭”^[14],这无疑成为随时威胁姬周统治的一大隐患。

基于殷遗民政治、军事实力尚存的事实,武王选择建立“三监”来加强对武庚及其殷遗民的监管。《史记·周本纪》记载:“封商纣子禄父殷之

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5]126}武王死后,管、蔡与武庚合谋反叛,周公为维护翦商基业,以彻底扫除武庚及殷顽民的反叛隐患,决定东征讨伐叛乱。《逸周书·作雒解》载: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叛)。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九(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4]234-235}

《史记·周本纪》记载:

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5]132}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

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5]1565}

除传世文献记载周公东征平叛外,金文中也有周公东征的相关记载:

沫司徒疑簋: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邠)于卫。(《集成》^③4059)

宜侯矢簋: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集成》4320)

小臣单觶:王后(坂、返)克商,才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集成》6512)

周公东征鼎:佳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薄古咸翦。(《集成》2739)

明公簋:佳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集成》4029)

这几则青铜器铭文均反映了周公、成王时期东征的史实,铭文中的东征主帅涉及成王、周公与周公子明公。彭裕商据有些铭文记载东征主帅为成王来否定周公东征的事实^④。但应该注意的是周公摄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王年幼,铭文在记述时写的是成王,但东征的具体指挥者可能还是周公。

在平定武庚叛乱之后,周公采取了多种方式对殷遗民进行分化安置。一部分殷遗民作为姬姓贵族的私属,随之迁徙至封土。《左传·定公

四年》记载: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11]1712}

一部分殷遗民被留在殷商旧地由周人统治者就地管理。《左传·定公四年》记载: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旄、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11]1714}

还有一部分殷遗民被迁至成周新邑集中管理,这一部分多属于殷之顽民。《尚书·多士》记载:“成周既成,迁殷顽民。”^{[1]219}一部分殷遗民由纣王庶兄微子启率领受封于宋,以续殷后,奉其先祀。《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公)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5]1621}这实际上是周公对一部分未参与反叛的殷遗民实行的怀柔政策。由此,周公在平定武庚之乱、东征商奄之后,彻底清除了周初灭商以来的隐患。

三、周公为安抚内部所作的必要妥协

从周初周公摄政的合理性及周公东征的事实来看,周公面对管蔡流言不可能选择“待罪避东”。那么“周公居东”是否只包含了“东征”一义呢?显然不是。在武王死后,国家尚未稳定之时,周公代成王摄政符合当时的现实需要,面对管蔡流言,周公不会选择退却躲避。周公如果选择“避罪待居”就掉入了管、蔡等人的圈套之中,反而证明流言非诬。但周公在面对流言时仍会有所忌惮。成王和其他贵族在听到流言之后对周公摄政作何感想,这些人能否理解周公的良苦用心,这都是需要周公回应的。为了安抚姬周贵族,使其不被管、蔡等人拉入反叛阵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周公也需要作出避嫌“居东”的姿态。这一“居东”不是因为流言,而是为安抚内部、孤立叛军的主动选择。

虽然周公摄政乃至称王符合周初继位传统,也是武王死后维护稳定的现实需要,但在当时统治阶层内部除管、蔡之外,也有其他反对声音。《列子·杨朱》记载:“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

公摄天下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15]从中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大臣之一的召（邵）公对周公摄政是心存不满的。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列子·杨朱》的行文顺序，“邵公不悦”在流言之前，说明召公并非因流言而产生对周公摄政的不满，是其自身对周公摄政行为不理解。周公如果不对摄政用意进行解释，不对召公不满作出回应，那么管蔡流言之后，召公恐会与管、蔡等人联合反叛，到那时对周公、对国运未稳的姬周王朝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因此，周公必须对召公的疑虑作出说明，作出妥协：

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说。^{[5]1549}

周公通过向召公作《君奭》、以殷代各时期辅政大臣辅佐君王治理朝政使殷商获得长久发展为例，来说明自己的摄政本意，最终获得了召公的理解。在说明摄政本意之后，周公还需要以实际行动来打消召公的疑虑。在了解“邵公不说”的前提之下，再对《尚书·金縢》中“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一句进行理解揣摩，其中隐含着周公以避居来打消二公疑虑的意味。清人皮锡瑞也指出：“观《金縢篇》公告二公以弗避义，则二公亦未尽知其心，盖以公处嫌疑之地，欲其远避。”^[16]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消召公等人的疑虑，一致对外剿灭叛乱。

对于周公的不解不可能只有召公等少数人，因此周公有必要对管、蔡与武庚之乱后摇摆不定的姬周贵族及分封诸侯进行一次集中安抚拉拢。《逸周书·作雒解》记载：

武王既归，成岁十二月崩镐，殂予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叛）。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九（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4]234-235}

这段记载可以看作周公在说服召公之后安抚贵族、诸侯的一个证据。另一个可以看作周公安抚姬周贵族的证据是清华简《皇门》中的相关记

载。清华简《皇门》是一篇关于周初政治的文献，“简文记载周公训诫群臣望族要以史为鉴，献言荐贤，助王治国，同时抨击了某些人阳奉阴违、背公向私的行为”^{[2]163}。目前学界对其具体成书年代存在分歧，形成了周公摄政初年、周公摄政后期以及周公摄政结束归政成王之时三种不同说法。确定《皇门》的具体时代，关系到对其文本史实主旨的正确理解。刘光胜将清华简《皇门》相关内容和《逸周书·作雒解》涉及的周公东征平叛相关内容对比之后，认为两篇所述之事存在诸多相同之处，《皇门》篇可能是周公摄政之初、管蔡之乱爆发之际，周公呼吁在镐京的姬姓世家大族协助自己，共度时艰的政治动员令^⑤。文中提到了周公对大门宗子、迓臣等人的训导，整理小组将大门宗子释为贵族及宗族嫡子，将迓臣释为亲近的臣子。周公通过对大门宗子、迓臣等人的教导与安抚，达到了孤立叛军的目的，随即东征讨伐管、蔡及武庚叛军。至此，因管、蔡流言而起的武庚叛乱彻底平定。

结 语

武王死后因周公摄政引发的管蔡流言及武庚叛乱，本质上是周初王位传弟立子之争与武王灭商遗留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周公“居东”是对叛乱分子的坚决打击与剿灭，是为使周族内部理解自己摄政本意、团结稳定、一致对外应对叛乱而作出的必要妥协与让步，以此来达到彻底消除周族内部与殷遗民内部反叛隐患、巩固与维护翦商基业的目的。

注释

①李学勤认为清华简《金縢》中“周公石（宅）东三年”与《诗经·东山》所云周公东征三年相合，因此周公居东应为周公东征，参见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刘国忠对汉代以来各家形成的“周公东征说”“周公待罪居东说”及“周公奔楚说”三种说法进行了整理论述，并根据清华简《金縢》中“居东三年”认为，把“周公居东”解释为“周公东征”是正确的，参见刘国忠：《清华简〈金縢〉与周公居东的真相》，《出土文献》第一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42页；王坤鹏比较了清华简《金縢》和《尚书·金縢》的叙事结构与用词，认为简本中“周公居东”的史事叙述与汉代古文经学家郑

玄、马融的“避居说”比较一致,参见王坤鹏:《简本〈金縢〉学术价值新论》,《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彭裕商认为,周公东征是由于奄君策划并参与了武庚、三监叛乱,而散布管蔡流言之时尚未与武庚发动叛乱,且东征主帅为成王,周公只处于辅助地位,因此“周公居东”不是东征而只能是避居于东,参见彭裕商:《〈尚书·金縢〉新研》,《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马坤将汉代今古文学家及清代考据学家对《尚书·金縢》中周公相关事件的注解进行梳理考证,认为汉代古文家的“避居”说为优,参见马坤:《〈金縢〉所见周公事迹考》,《励耘语言学刊》2015年第2期;杨朝明、马卫东则认为,“周公居东”既非避罪也非东征,而是周公为了调查三监叛乱的阴谋与事实,深入武庚与三监叛乱的策源地,为东征所作的充足准备,参见杨朝明:《周公东征史实论说》,《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另见马卫东:《“周公居东”与〈金縢〉疑义辨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2期。②周书灿:《〈殷周制度论〉新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再考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文中简称《集成》。④彭裕商:《〈尚书·金縢〉新研》,《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⑤刘光胜:《三监之乱与周公治国谋略的展开——以清华简〈皇门〉为中心的考察》,《古代文明》2020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
- [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陈抗,盛东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32.
- [4]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7]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362.
- [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61.
- [9]尉博博,王向辉.春秋鲁国“一继一及,鲁之常也”辨[J].社会科学论坛,2010(10):170.
- [1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08.
-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2]杜正胜.略论殷遗民的遭遇与地位[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五十三本第四分,1982:691.
- [13]许倬云.西周史[M].增补二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16.
- [14]杜勇.从三监看武王大分封的性质[J].人文杂志,1999(1):95.
- [15]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232.
- [16]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9:381.

“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 of *Jin Teng* Is Analyzed Again

Zhang Xinbin and Ma Jiaqi

Abstract: 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 in *Jin Teng*. First one is “the Duke of Zhou emigrated to the east and wait for the punishment”, second one is “the Duke of Zhou’s eastern expedition”. “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 was raised by rumors from Guan and Cai, and the rumors “Duke will be against the Ruzi” essentially aimed at whether it was reasonable for the Duke of Zhou to regency and to be a king after the death of King Wu. Thi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 Judging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succes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Zhou dynasty, the lineal primogeniture system had not been established. It is reasonable for the Duke of Zhou to take the helm of state and even become king after the death of Wu King who founded the Zhou dynasty. The Duke of Zhou wouldn’t avoid living in the East because of the rumor of Guan and Cai. “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 has two meanings. First,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Overthrow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Duke of Zhou chose to go to the east to fight the rebellion of Guan Cai and Wugeng; second, faced with the rumors of Guan Cai, the Duke of Zhou sought to stabilize the internal unity of the Zhou nationality and deal with the rebellion in a unified manner, so as to avoid the doubts about his regency within the ruling class.

Key words: *Jin Teng*; the Duke of Zhou’s residence in the east; succession to the throne; the Duke of Zhou emigrated to the East and wait for the punishment; eastern expedition

[责任编辑/启 轩]